

大连外国语大学2015年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 翻译文学经典的 经典化与经典性

——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研究

于 辉◎著

译外管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在外国语大学2015年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 翻译文学经典的 经典化与经典性

——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化与经典性：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研究/于辉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7.4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5 年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ISBN 978-7-5610-8539-4

I. ①翻… II. ①于… III. ①《包法利夫人》—文学  
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973 号

### 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化与经典性

FANYI WENXUE JINGDIAN DE JINGDIANHUA YU JINGDIANXING

---

出 版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印 刷 者：鞍山新民进电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 张：7.625

字 数：220 千字

出版时间：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崔利波

封面设计：韩 实

责任校对：金 山

---

书 号：ISBN 978-7-5610-8539-4

定 价：35.00 元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邮购热线：024-86830665

网 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mailto:lnupress@vip.163.com)

## 前 言

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从它在译入语环境中被初次评介到“遍地红花”的翻译盛景，再到为各类读者接受并产生影响，必定经历一番复杂的旅程。而在这一番风雨历程之中，经常会有“杰出译作”的诞生。“杰出译作”是译者辛苦走过与原作、原作者相识相知的心路的优秀成果。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原作在译入语环境中的翻译，以及其译作被接受、产生影响等活动或现象，既是原作文本与译作文本间的互文，也是译入语社会、文化等与原作以及原作中包含的原语文化互文的结果。根据这种互文关系，结合查明建（2004：87）对翻译文学经典类别的划分，我们可以将翻译文学经典做以下更为具体的分类。

第一类，原作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在译入语中得到广泛的译介与推崇，复译本频出。这些译本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但原作仍会通过它们在译入语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这一类“翻译文学经典”并不强调个别译者的作用与个别译本的优秀与否，而是一个整体的、较为抽象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翻译过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心词是“翻译”、“文学经典”，如汉译《包法利夫人》、汉译《高老头》、汉译莎士比亚戏剧等。

第二类，译作是杰出的翻译作品，原作也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主要含义是“翻译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因而这种“翻译文学经典”是个别的、具体的概念，中心词是“翻译文学”、“经典”，如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杨必译《名利场》等。它们都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文学经典，也

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

第三类，原作在原语环境中算不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但在译入语环境中或由于译者“经典”的“再创作”，或由于迎合了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等的需要，成为译入语环境中经典的翻译作品，如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等。这可以算得上译入语中的另类“翻译文学经典”。这类“经典”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畴内。

由此可见，第一类“翻译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整体性所指，是不拘泥于字面意义而具有文学或文化特征的翻译，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翻译和文学或文化的阐释。它应该包括某部经典原作在译入语中的大部分翻译作品（抄译、滥译等违反翻译道德的译作除外），它的“经典”性质源自其原作的经典地位与其各个译本所构成的整体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对它的解读涉及译介与接受史研究。研究者不仅要理清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译介之后，其多个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基本面貌、发展历程和相互关系，还要评述它们与译入语文学文化等的互文情况。因此，这一研究也可作为第二类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化的背景研究。因为在外国文学经典的译介历程中，在同一原作的众多译本之中经常会产生经典的译本，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文学经典（下文中如无特别提示，“翻译文学经典”均指第二类翻译文学经典）。对翻译文学经典的解读，主要从翻译学出发，深入探讨经典译本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经典表现与其经典性所在。以上研究不仅涉及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宏观之社会、文化、文学环境等，也涉及微观的文字、文本以及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主体作用。因此，对第一类“翻译文学经典”“建构”历程（或者说是对其一部经典外国文学作品在某一译入语环境中的译介与接受）的研究，也是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化的背景研究。同时，这种“背景”研究可令我们以“史”为鉴，在了解文学翻译历史、翻译文学发展的同时，去反思当前的文学翻译形势，以传承优秀的文学文化传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而对第二类翻译文学经典的研究，不仅可以发掘其审美价

值、超越性与典范性等，还可以为我们的翻译活动树立起可供学习的榜样，以传播高超的翻译技巧，提高翻译的质量，进而为我们在更高的理论层面探讨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化与经典性，以及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经典的关系提供契机。

具体说来，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翻译理论是对翻译活动的原理，对翻译结果等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翻译文学经典作为公认的、一流的、可以成为典范的优秀翻译结果，它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其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其经典性质与表现、其经典的传播过程等均可以成为翻译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上述研究也正是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一方面，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翻译过程研究、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翻译标准研究等一系列问题，直接表现为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的展开；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者依据翻译文学经典提出的普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乃至翻译技巧等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第二，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翻译批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某一译作所做的较为客观的评价。翻译批评家的批评工作常常关系到一部译作的“命运”，是成就一部翻译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在众多翻译文本中发现和指认其中的经典之作也是翻译批评肩负的任务之一。反言之，既成的翻译文学经典又可以成为其他翻译批评的尺度和参照，因为翻译文学经典是“个别与一般的完美统一”（陶水平 2007：272）。

第三，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翻译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翻译文学史是依据年代对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在某一译入语环境中的译介情况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翻译文学作品加以排列。这种排列涉及对翻译文学作品以及不同译者的取舍，涉及对不同译者与其译作的具体评价等。所以，翻译文学史研究与翻译文学经典研究息息相关。翻译文学史的编写需要对经典译作作出选择并列出选

择依据，而后将其反映在翻译文学史著作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翻译文学经典在翻译史研究中产生——在不同年代的读者与批评家的不断诠释中确立并流传，同时也是翻译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四，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现阶段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研究，而翻译正是这种交流的桥梁。所以，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又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而翻译文学经典又是翻译中必须谈及的部分，因为它在两种文化的沟通交流方面能够起到普通翻译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作用。

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翻译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常常通过一系列经典译作中的译例对学生进行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理念等方面的教育。所以，翻译教学离不开翻译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经典不仅可以在翻译技巧等“理”的层面给学生以帮助，也能在译作的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等“文”的层面给学生以启示。

第二，在中国与世界接触与交往空前频繁的今天，翻译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之相关的成果、机构、人员等与日俱增。翻译活动在帮助人们实现交流沟通目的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于是便出现了为翻译之“利”是图的行为与结果：粗译、滥译甚至抄译等有悖于翻译道德的现象不断出现。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读者的视听，扰乱了翻译市场的秩序。另一方面，翻译实践的活跃也带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兴盛，翻译学、译介学等日益蓬勃，并呈现出多角度、跨学科、高深度的研究态势。但一些理论与观点给人以玄而又玄感觉，甚至与翻译实践大大脱节，成为“自娱自乐的理论的高难度表演”（王建刚 2012：7）。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认清翻译界现状的前提下，端正态度，遵循从翻译实践出发、为翻译实践服务的宗旨进行翻译研究。所以，以经典翻译作品的建构之路与其经典性质为研究对象，以译界前

辈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翻译态度、治学修为等，正是实现这一研究宗旨的有效途径之一。

概言之，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关联着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批评、译者研究、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教学等众多与翻译相关的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以“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化与经典性”为题，主要通过通过对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经典个案的分析，探究翻译文学经典一般的经典化要素与经典性体现。

当代翻译理论认为，原作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他创作的文学文本是译者重写译本的依据……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对读者来说是有权威的……’。”（赵小兵 2011：51~52）因此，无论是翻译活动本身还是翻译研究，对原作者以及原作的选择都十分重要。原作者的创作特点及其影响力等是影响译作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一部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入译入语环境中时，其译作会凭借原作在原语环境与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性质与影响力在译入语环境中大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译者可以透彻领悟原作的特点并在译作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翻译文学经典诞生的几率就会增大。

福楼拜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更是开启了现代小说之旅。在中国文坛，福楼拜的“影子无所不在”（钱林森 1994：35）。早在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茅盾等人就开始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福楼拜及其《包法利夫人》。时至今日，“包法利夫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已近一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初期的经典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去经典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再经典化以及21世纪的经典延续等种种复杂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奇幻漂流”，从中折射出20世纪初期至21世纪的今天，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状况。对这样一部作品的汉译经典进行研究，可以实现上文中提及的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的目的，其意义实



为重大。到目前为止，《包法利夫人》的汉译本多达四十余种，它们共同组成广义的翻译文学经典《包法利夫人》，对我国 20 世纪“新文学”、“新文化”的建构，对作家的创作、学者的研究、中法文学文化的交流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李健吾所译《包法利夫人》从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成为历经半个多世纪仍被众多读者喜爱的翻译文学经典之作。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当之无愧且最为重要的主体。他的选择、取舍、动机，以及他对原作的理解、把握等会直接影响翻译的结果。因此，对“创作”了翻译文学经典的译者进行研究，既可以探索其成就“经典”的原因，又可以为广大译者提供有借鉴性的参考。

李健吾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翻译过福楼拜的几乎全部作品。他所译的《包法利夫人》拥有众多的读者（包括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等），成为诸多译本中的佼佼者，是老一辈翻译家和学者推崇的“定本”（罗新璋，引自周克希 2001：155），被奉为经典，“福楼拜”、“包法利”等译名也因他而定，并广为流传。李健吾本人是中国对福楼拜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对福楼拜创作理念与作品风格的理解和把握准确精辟，迄今仍无人“出其右”（柳鸣九，引自李健吾 2007a：序 3）。而他本人与福楼拜在文学思想与艺术追求方面也极为契合，这是李译《包法利夫人》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的关键性前提。李健吾翻译家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他的翻译活动、翻译理念、翻译经典成果及其影响必定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我国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更鲜有人从“翻译文学经典”的角度对李译《包法利夫人》进行研究。国内对李健吾本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忽略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在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译介中的典范力量。所以，我们以李健吾译本经典为对象，研究其生成的各个环节，系统探索译者取舍的深层动机和经典方法，并在语言外层面探讨制约译者译介和读者接受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旨在进一步

理解文学翻译活动的实质和意义，提高翻译批评的力度。从翻译史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翻译高潮，但其中良莠不齐、粗制滥造等现象不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李健吾的经典译作可以与翻译界当前的动态取得联系，可以为我们树立一个踏实认真的榜样，从而使我们的理论与翻译实际联系起来，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加以研究。而在此之前，必须对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作出关照。

首先，关于“经典”与“翻译经典”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批评探索》杂志组织了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讨论，关于“经典”的争论就此兴起。布鲁姆、库切、佛克马等人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对“经典”的看法与观点，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文学经典建构或经典化研究的热潮。在新兴的“经典”研究中，文学经典不再被视为具有永恒价值与远离政治利益，人们认为其建构由作者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决定。20世纪90年代，文学经典研究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话题，《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童庆炳、陶东风2007）、《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阎景娟2010）、《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林精华等编2010）等著作得以出版，并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的经典化与经典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讨论研究。在文学经典研究的带动下，“翻译经典”或“翻译”与“经典”也开始受到翻译界的关注，并不断有相关专著、论文等面世。宋学智的专著《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2006）开法语语言文学界翻译文学经典研究之先河。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傅雷汉译经典上，关注更多的是“经典”的影响与接受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奚念的博士论文《翻译在外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2009），以《简·爱》汉译为例，将翻译与“经典”研究相结合，但更多的是以翻译为手段，研究其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助推作用。此外，刘军平（《翻译经典与文学翻译》，2002）、区轶和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寒山诗

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2008)、王静和兰莉(《翻译经典的建构——以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例》,2010)、王恩科(《论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2012;《论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2013)、涂兰娟(《朱生豪莎剧译本经典化成因探析》,2013)等学者也发表过与“翻译经典”相关的论文。他们或讨论翻译经典对原作经典化的作用,或研究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及它与文学经典的区别问题。但总的看来,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对翻译文学经典的定位及其经典化与经典性仍旧缺乏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从相关著作与文章的发表时间可以看出,翻译文学经典研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关注,但涉及的翻译家与译作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却极为有限。所以,翻译文学经典拥有广阔、有待系统化且更为深入的研究空间。最后,为深入发掘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与经典性质,本研究选择了始于法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目前,在我国,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成果已不在少数,翻译的互文性质也取得了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但将其应用于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尚无前例。在翻译活动中,译作文本“跨越文化障碍迁移了文本,且与原著和其他相关的文本、译本以至于翻译活动的政治、经济环境和译者自身状况等要素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秦文华 2002: 57)。为此,我们可以将翻译活动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互文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文化、文学、政治乃至经济等诸多“文本”均参与其中,与译作文本一起构成复杂的互文性网络。而译作文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它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连接起来,彼此沟通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均参与其中,因而交流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译作的质量(除特殊历史时期外,如五四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翻译文学经典可以将译作与原作背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推向翻译活动所能达到的最深程度。

其次,与原作、原作者相关的研究现状。在 19 世纪法国文

学史中，福楼拜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既继承前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使他成为“现代小说的接生婆”（冯汉津 1985：284），开启了现代小说之旅。到目前为止，该小说在中国的译本多达四十余种。同时，国内文学界、比较文学界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由来已久且层出不穷，如《〈包法利夫人〉和〈金瓶梅〉》（李万钧 1986）、《“爱真与美的‘冷血诗人’”——福楼拜在中国》（钱林森 1994）、《潘金莲与包法利夫人》（刘绍智 1994）、《“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与“描写女人的方法”——福楼拜与丁玲》（钱林森 1995）、《东方的福楼拜与中国的左拉——李劫人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钱林森，2011）、《丁玲对福楼拜的审美接受》（韩晓清 2011）、《〈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王增岩 2011）等。在译介学方面有周小珊的博士论文《〈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影响研究》（南京大学 2003）在翻译学方面有赵丹霞的博士论文《文学风格的翻译——以〈包法利夫人〉的三个中译本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等。比较文学方面的对比研究使我们看到《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大部分是由其译作带给我们的。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周小珊的博士论文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且较为详尽的史料。但她的论文以评述《包法利夫人》在中国译介的史实历程为主，主要研究对象是该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没有凸显经典译本的作用、价值，因而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研究。此外，笔者在对其论文的阅读过程中也发现个别史实方面的谬误，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更正。王增岩的硕士论文从翻译角度对《包法利夫人》原作在中国的经典化的作用做了概括性呈示，把翻译当作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完成其经典性建构的一种手段，仍属文学经典建构研究范畴，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因而研究方法与所得结论有很大差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篇学位论文虽然没有对李健吾译本展开研究，但都提及了这一译本的经典性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本研究提供了写作理由与研究空间。

最后，关于译者李健吾。李健吾是我国近代的知名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家，被誉为福楼拜的“知音”（魏东 2007：16）。他写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评论性著作《福楼拜评传》至今无人超越。其译作《包法利夫人》被专家学者视做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甚至被称为“定本”。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李健吾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文学批评或法国文学对其影响等方面，比如《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季桂起 1992）、《李健吾文学批评新论》（陈政 2001）、《一种准现代感悟诗学——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欧阳文风 2008）、《李健吾文学批评的自然主义倾向》（范水平 2011）、《李健吾与法国文学》（钱林森 1997）、《李健吾与福楼拜和自然主义》（范水平 2011）、《科学性·判断力·艺术性——论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蒋勤国 1991）等。而关于其翻译家身份、翻译成就以及对他的福楼拜作品尤其是《包法利夫人》的经典翻译尚无专门的研究著述（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是为翻译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所以，面对这样一位经典译家及其经典译作，我们有理由也必须对其经典的翻译过程、翻译理念、翻译手法、翻译结果以及翻译作品的影响等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根据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研究的主题，我们欲实现以下研究目标：

1. 以当下我国学界关注的互文性理论为阐释依据，通过对汉译《包法利夫人》在跨文化互文性网络中与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各类文本互文性关联的讨论，将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提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力求做到以点带面，以从中折射出近代以来中法两国在文学、文化方面的互文性互动历程，以及这种互动对于中国这个译入语环境的重大意义，进而为翻译文学经典（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的诞生、发展与最终确立提供背景研究。

2. 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研究对象，阐释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化历程与影响因素。从内部探讨翻译经典形成过

程中译者主体的多重作用，其中包括译者李健吾与原作者福楼拜的艺术理念与追求的高度契合；通过对译作与原作以及其他译本之间的比较，展示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把握、对译入语的操控能力以及在具体的语言转换经典方面的翻译方法与技巧等，以实例证明其译作本身的经典性质。从外部探讨经典译作传播过程的经典化：意识形态、诗学、社会学等权利话语的制约或“赞助”，以及接受美学视角下各类读者对译作经典化的推动力。

3. 由对李健吾译本经典的个案研究，推及对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化与经典性的理论探索。在中西理论共同关照下，研究总结影响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诸多要素及其经典特征，探讨翻译文学经典为研究者留下的阐释空间和为读者创造的审美、接受空间。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第一章，翻译文学经典背景研究，包括理论背景研究与《包法利夫人》译介背景研究。首先论述互文性理论的应用与翻译文学经典研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而后在互文性理论的框架下，对《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做概括性与理论性的阐释。笔者认为，对一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是各类文本交叉互动与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间经历文本阅读与文本利用、文本翻译、文本互动等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译入语的文学、文化、社会等文本由于产生强烈的接受需求，开放了自身并引入原作以及原作背后的文化、社会等互文性网络，以达到改造、更新并发展自身的目的。而原作与其相关的互文性网络也走进了新的环境，产生新的价值和影响，完成了在新环境中的经典化。同时，在较为漫长的译介与接受过程中，译入语社会中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的变革与动荡会推动或阻滞上述的经典化过程。但是，质量上乘又广受欢迎的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却经受住了时间与时代的考验，成为“流传下来”的翻译文学经典。

第二章，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之经典化内因。“内”是指译作文本之内。译作也是译者的“作品”。所以，本章主要从

译者与译作两个方面分析李健吾译本经典得以产生的文本内因素。第一部分，从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与李健吾其人谈起，通过对李健吾与法国文学、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相识相知历程的评述，加之对其翻译成就与翻译观念的探寻，研究李译《包法利夫人》经典化的译者内因与前提基础，即译者主体与原作者主体高度的主体间互文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译者李健吾才会“创作”出经典的译作文本。第二部分，通过译例和译例对比（与时下颇受欢迎的周克希、许渊冲译本比较），论证李译《包法利夫人》译作本身的经典之处。其中包括：（1）福楼拜之“真与美”的经典诠释：从李健吾对《包法利夫人》中极具“真与美”特色的两个方面，即小说人物视角下外部客观世界和人物内心世界的逼真再现出发，以李健吾的翻译观和艺术观为阐释依据，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译本的比较，展示李健吾对原作的成功诠释，探讨其经典之处；（2）李健吾对原作与译作中文化互文性因素的经典处理方式：从互文性角度看，李健吾译本不仅“尽传原著之精神、气势”（罗新璋），更与各类相关文本间形成了恰到好处的互文性关联；（3）李健吾对《包法利夫人》其他特点的经典传译。

第三章，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之经典化外因。从互文性角度看，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译作文本同广义文本与狭义文本间互文性互动的结果。在广义文本方面，社会因素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以及深受它们影响的赞助人和普通读者都参与其中。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上述因素对翻译文学作品之经典化的作用力是不同的。只有当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审视回归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对翻译文学作品的判断也回归学术的与艺术的视角，某一部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其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建构。所以，李译《包法利夫人》历经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政治学解读、“文革”中的消匿和新时期对学术性、艺术性的回归，最终完成其经典化历程。斯蒂文·拖拖西（1997）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将读者作为经典形成的关键性因素。

---

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是如此，其经典化需要得到各类读者的广泛接受和肯定。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一切学术、文艺活动的标准。翻译文学作品的各类读者（包括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等）可以对以《包法利夫人》为代表的翻译文学作品展开学术性、艺术性的阅读、阐释和研究，我们也可从他们对该部译作的解读、引用和接受中得到经典化的佐证。当然，这种接受和肯定会体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也即不同的狭义文本，如翻译批评文本、翻译研究文本等）。

第四章，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化要素的理论分析。本章在《包法利夫人》译介与接受研究、李译经典化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要素做理论性探索。从译作文本内部看，其经典化要素包括：（1）译者因素。包括译者与原作者高度的主体间互文性、译者对原作意义的不俗把握、译者的“作家的才情”以及译者“正确”的翻译观念等。（2）译文因素。在译者具备上述“特征”的前提下，才会产生经典的、既“忠”且“美”的译文。从译作文本外部看，首先，经典译作的原作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拥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穿越性、无限的可读性和强烈的审美性或艺术性”（刘象愚 2006：51~54）。其次，翻译文学经典多在复译中产生，同时也是同一原作多个复译本中的优胜者，在与其他复译本的比照中产生。最后，译作只有被传播、被接受才能最终完成其经典化。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翻译文学经典接受的角度不尽相同。

第五章，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性：（1）通过翻译文学经典与翻译文学以及文学经典的区别研究，探究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性所在。笔者认为，翻译文学经典是翻译文学中经过时间考验的上乘之作，同文学经典一样拥有审美性、艺术性与跨年代性。（2）翻译文学经典自身的经典性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在感性认识层面，翻译文学经典拥有“文学经典”性和“翻译经典”性。②在理性认识层面，翻译文学经典具有高度的主体间互文性，翻译文学经典文本自身具有高度的互文性，翻译文学经典也能对后来的



译者产生“焦虑性”。③在可参考层面，翻译文学经典是翻译实践的典范，可以传播丰富多样的翻译技巧等，同时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对译入语环境中的语言发展、文学进程等也具有可参考性。

结论：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加以总结，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并对与翻译文学经典相关的后续研究作出设想。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对翻译研究界较少涉及的翻译家李健吾作出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从他的翻译事迹、翻译理念到译者李健吾与原作者福楼拜的深度契合，从他对原作无人能及的深入理解到对其精彩译文的展示，以及其译作《包法利夫人》的广泛接受。（2）对翻译文学经典之经典化因素做理论性阐释。认为社会、文化、政治因素等为其经典化的背景因素；译者的一系列“经典”素质和译作对原作各种特点的经典传译为经典化之文本内因素，其中译者与原作者高度的主体间互文性是成就翻译文学经典的关键性因素；原作的经典性质、复译以及各类读者对经典译作的认可、传播与接受是其经典化的文本外因素。（3）对翻译文学经典的经典性作出探索：从翻译文学经典的概念范畴看，涉及它与“经典”、“文学经典”以及“翻译文学”等的关系问题；从翻译文学经典本身看，从感性认识层面、理性认识层面与可参考层面出发，涉及译作与原作关系、译作本身特点、其传播与接受以及翻译文学经典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等的参与问题。

“译作是译语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反过来又对译语社会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描写译学主张翻译研究要注重译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关系，注重译文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译文的独立价值与功能。”（何元建、卫志强 2003：2~3）本研究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互文性理论为主要研究框架，并综合翻译学、译介学、文化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李健吾译本经典之经典化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为从理